

传统文化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杨发喜

(《求是》杂志社,北京 100727)

[摘要] 新安全观是中国对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贡献。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安全理论,必须从挖掘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入手。新安全观的精神实质是天下为公思想,它的逻辑前提是相互尊重,它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外交的最高理想——和谐世界。

[关键词] 新安全观;天下为公;相互尊重;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 D 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06)04-0062-05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冷战后中国人所发明和倡导,并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加以贯彻且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安全观。它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是中国对国际安全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在,它已被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价值观。中国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社会大力推荐这一中国特色的安全观。为什么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世界许多国家,与中国同样面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新安全观,而被中国人发现并提出了呢?这需要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里去寻找答案。换句话说,新安全观里所体现的指导思想、价值追求,乃至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追求。因此,认真挖掘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源,对于理解和把握新安全观的实质,进而思考人类未来和平与安全的前途与命运是大有裨益的。

1 天下为公——新安全观的实质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为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而提出的伟大目标。他还针对当时中国人民普遍重文轻武的传统,响亮地提出“尚武”的口号,目的是救亡图存。但是中国的传统理想却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后人如顾炎武、王夫子特别区分

“国”与“天下”的差别,置天下于国之上,以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1]可见,民族国家是一部分人的,而天下则是全人类的。中国的天下主义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人类的文明开化,它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汤因比教授曾说过,中国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文化。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天下主义的内涵呢?这与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以及社会结构有关。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对峙,天下主义显然还不可能被接受。当时通行的是“民族主义”:你是楚国人,我是齐国人。哪个国家越抱团,越会合谋使用暴力,哪个国家就越占优势。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建立了帝国,但仍实行战国时代的“民族主义”策略,结果二世而亡。在秦统一基础上建立的汉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吸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包含有天下主义的文化,并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期,最终消除了“国”的概念。从此不再有齐国人、楚国人,天下主义诞生了。对于这段历史,汤因比给予了高度评价:“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与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2]为什么只占世界一部分的中国实现的是天下主义的文化呢?因为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技术条件下,中国与其他高级文明,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

[收稿日期] 2006-05-21

[作者简介] 杨发喜(1963—),男,江苏淮安人,《求是》杂志社副编审、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研究。

文明是相对隔绝的,没有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明显的对峙。所以当时中国人念念不忘追求的是“天下太平”,而不是“富国强兵”或者“国家利益”。

欧洲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只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才有过短暂的统一。在这之前和以后,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换句话说,欧洲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欧洲人在近代以来对世界的影响,一个重要方面是把战国规则带到了全世界。正如陈独秀所言:“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3]因此,欧洲的外交政策必然以民族主义为主导。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2]。

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今天,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应该承认,中国人是在近代以来抛弃了天下主义,转而采用民族主义的,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在天下主义的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是防御的或“解放的”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中国民众免遭亡国灭种厄运的民族主义。它在世界上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同时声明自己“永远不称霸”。它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仍是包含了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例如,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独一无二地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战胜国,中国对曾经残酷屠杀和蹂躏她的人民的日本表示了过度的宽容。在这些事实背后,贯穿着中国人独特的天下主义逻辑,即民族主义可以救中国,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今天中国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是强调共同安全,它要扬弃的是以武力或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片面安全观。它是一种无敌国的安全观,强调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渐突出的非传统安全。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在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会议上谈到新安全观时强调:“当今世界不存在安全两难悖论。在国与国的安全关系中,不应该存在一国要获得安全就必须牺牲他国安全利益的‘零和’关系。国际社会的实践证明,和则共赢,合则同安,没有别的选择。基于这种认识,中国追求的最终目标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并主张以此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方向和基础。”^[4]这种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强调的共同安全观念,无疑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精神的新体现。

2 相互尊重——新安全观的前提

以天下为公为背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理念,必然要求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尊重为交往原则。新安全观实际上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时代新的发展和具体化。五项原则首先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新安全观首先强调的是互信,即超越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分歧,相互尊重。二者含义和精神实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中国人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一再强调相互尊重这一原则呢,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以伦理本位而非个人本位有关的。换句话说,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人生价值追求是以伦理本位为基础这个大背景,便不能理解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倡导国与国交往原则时强调相互尊重的深刻含义。

中国人认为,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且始终在与人们的相关系中生活(不能离开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是指人们彼此之关系。家人父子,是人类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就是相互间的义务关系。伦理之理,必须于情与义上见之。从社会角度看,有“师父”之说,有“徒弟”之说。于官员经常称“父母官”,而公民却有“子民”之说;于乡邻朋友,则互以伯叔兄弟相呼。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中国人这种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的社会,与西方民族国家团体组织是差异很大的。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

中国人热爱家庭,对家族的荣辱兴衰非常重视,以至于—往情深。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传统遵循的人生五条原则。请看孟子是如何说的:“仁之实,事亲是也。意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以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对于孟子这段话,老百姓有句通俗的话解释就是“居家自有天伦乐”。

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尊重对方。何谓好父亲?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何谓好儿子?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何谓好哥哥?常以弟弟为重的,就是好哥哥。何谓好弟弟?常以哥哥为重的,就是好弟弟。客人来了,能以客人为重的,就是好主人。客人又能顾念到主人,不为自己打算而为主人打算,就是好客人。一切都是这样。所谓伦理者,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互关系之道理,于彼此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一句话,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在以伦理本位为基础组织的社会中,一个人似乎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所以在中国传统中,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价值,自由、人权、民主的概念都是无法想像的。

从今天看来,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这是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不可避免之缺点。又且中国人不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容易扼杀人类的个性和创造力。但是伦理社会强调和训练出互相以对方为重,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生存智慧。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争斗和战争,其教训非常惨痛。引起战争的固然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宗教原因,但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冲突双方充满敌意,没有相互信任和尊重,没有共同遵守的人类道德。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就必须从相互尊重开始。而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以强调相互尊重为前提的。中华民族不但在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发展中以自己的实践证明,相互尊重是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成功之路。而且在冷战结束后,在“上海精神”的形成,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尊重的精神创造性地运用在与有关各国的外交关系中。

3 和谐世界——新安全观的追求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不胫而走,种种对中国的怀疑也流布四方。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在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演讲中指出:“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参考消息》2002年11月3日报道说,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某研究员指出:“东南亚不像中国那样抵触日本的军事力量,倒是对中国抱有怀疑。为了牵制中国,希

望能对日本表示鼓励,从地区安全出发,日本修改宪法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大国应该有大国的理想。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中国整个外交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全面把握新安全观,必须对中国外交的更大理想,也是新安全观的根本追求——和谐世界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想有四大特征。第一,和谐世界是持久和平的世界。用中国古语说,就是天下太平。胡锦涛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中强调:“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5]第二,和谐世界是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上的落后与贫困,往往是诱发社会动荡、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锦涛指出发展“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5]。第三,和谐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第四,和谐世界是交流合作的世界。中国认为,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该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胡锦涛指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5]

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想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这种贡献是深深打上“中国特色”烙印的。因为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中是具有精神和实践基础的。《尚书·尧典》有一段赞扬古代圣王尧的德行和政绩的文字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译成白话文就是:“考查古时传说,帝尧的名字叫做放勋。他恭敬地处理政务并注意节约,明察是非,态度温和,诚实严谨,能够推贤让能,因此他的光辉照耀四海,感动周围。他以道德使同族人亲密地团结起来,族人团结后,又表彰和鼓励百官中德才兼备的人。国内的事情处理妥善了,又努力帮助其他各个邦国之间团结和睦,亲如一家。人民群众相互之间关系变得非常和谐。”^[6]《尧典》的上述记载,正是中华民族祖先处理与各个邦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理想。其精神实质就是以道德修养和教化

为本,以治理好自己国家为前提,以达到“协和万邦”的理想。

中国人把“和谐”理解为万物生长的基础,是世界起源的根据。西周末年的政治家史伯特别注意区别了“和”与“同”这两个范畴的意义。他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意思说,“和”才是万物生长的法则,而没有对立面存在的简单的“同”则不可能产生任何新事物。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7]就是说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富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用尽之后就完了。史伯还以五行相配生成万物,五味相调以成美味,六律相和以成悦耳音乐的道理来说明他的“和而不同”的原则。依据这样的原则,史伯断言周幽王必定要失败。他的理由就是周幽王专门喜欢“同”,却抛弃了“和”。史伯的思想对后来中国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老百姓则有“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等说法。

从思维方式看,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和谐统一,认为在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中,同一性更为根本,而对立和差异乃是包含在统一与和谐之中的。两(对立)乃一(统一)的固有内容,一乃两之本来根据。中国古代对辩证法研究极深的北宋哲学家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细蕴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张载:《正蒙·太和》)“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张载认为,所谓道就是太和,太和即气(物质)的总体。这所谓太和,即是至高无上的和谐,这和谐不是排斥差异和矛盾的,相反,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和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相感”),乃是太和所固有的,而这对立面及其相互作用又是事物外在对抗与冲突(细蕴、相荡、胜负、屈伸)的根源。张载又说:“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正蒙·太和》)

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根源还在于中国是个大陆国家,农业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本。农民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农民从事农业耕作受科技条件的限制,特别渴望风调雨顺,因此他们对大自然非常敬畏。这种敬畏以一种追求“天人合一”精神的形式,强化了中国人关于和谐世界的人生理想。人为什么要追求“天人合一”呢?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周易·序

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周易·文言》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变化的规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即天人协调一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基督教经典《圣经》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圣经还说,人和自然本来相处得很好,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智慧果,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上帝让蛇与人世世代代为仇,让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使人必须终年劳苦、汗流满面,才能得到吃的。这些传说,隐含着一系列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人要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们都不愿意化气力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战胜自然。在这方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培根的观点。培根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克服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因此要研究自然,探求自然的规律。征服、战胜,等等观念是与和谐、合一观念格格不入的。因此,从西方文化的传统看,要让西方相信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理想,是有一定难度的。

20世纪初,精通近十国文字,英语水平被孙中山誉为中国第一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在他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事实上,要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8]与此同时,他还补充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还有特别灵敏的特征。他断言,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法国人将由此获得一切——深沉、博大、纯朴和增强他们目前所具有的更完美的灵敏。^[8]现在,中国正在崛起,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我们说,历史不能中断,要想了解中国今

天和未来的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特别是中国文明是那么悠久和独特。事实上,中国当代的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出和实践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不少内在的精神联系

的,值得我们很好地深入研究,本文不过是粗浅尝试,目的是抛砖引玉,期待海内外所有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更多的指教。

[参考文献]

- [1] 顾炎武. 正始[M]// 顾炎武. 日知录: 卷十三.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7: 593.
- [2] 汤因比, 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88.
- [3]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M]// 陈独秀. 独秀文成.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27.
- [4] 崔天凯. 中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J]. 求是, 2005(15): 57-58.
- [5] 胡锦涛.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R/OL]. [2005-09-16].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
- [6] 王世舜. 尚书译注[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4.
- [7] 郭国义, 胡果文, 李晓路. 国语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488.
- [8]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5-6.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ina's New Security Theory

YANG Faxi

(Qiu Shi Magazine Office, Beijing 100727, China)

Abstract: China's new security theory exhibits a great contribution made by China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A comprehensive and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is new securi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approached from a study of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gist of this new security theory is the idea of the world for all; its logical proposition lies in the idea of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alues it pursues foster the ideal of a harmonious world, which embodies the highest ideal China pursues in its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new security theory; the world for all; mutual respect; harmonious world

(责任编辑 张阳)

(上接第12页)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up Core Competence of an Applied University

ZHU Kero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n applied university usually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having a short history, being oriented to the public, providing local services, and emphasizing applied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With its limitations in facilities, funds, and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an applied university has to manage to build up its core competence amo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through its scientific orientation,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eft management.

Key words: applied university; core competenc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deft management

(责任编辑 杜鸿燕)